

客家研究輯刊

THE PERIODICAL OF HAKKA RESEARCH

2005 年第 2 期(总第 27 期)

NO. 2 2005 (Vol. 27)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Hakka Research Department of Jiaying University

客家综论

- 客家群体组合和客家称名出现综述 杨 豪(1)
- 从自然灾害的角度看客家精神特质的形成 邹春生(16)
- 认识传统文化,培育客家精神
- 从华侨文化看客家传统精神的再造 魏明枢(23)
-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承 谢重光(26)
- 从谱牒的家规家训看客家人的价值观念 李小燕(33)
- Historical Sources on the Hakka in Thai An Introductory Note 小泉顺子(38)
- “美浓学”的研究基础 萧盛和(43)
- 论全球化时代的客家文化 陈雁飞(46)
- 从一份土地买卖契约管窥徐氏东海堂之播迁 徐胜一(49)
- 逃亡与迁徙路上的宽容 张 瑾(52)

客家文学艺术研究

- 发展客家音乐的几点思考 李寿彝(58)
- 论文化整合与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 江金波 司徒尚记(60)
- 客家山歌器乐化探索 刘鸣钟(66)
- 粤北客家民间文学简介 曾汉祥(68)

客家妇女研究

- 从古文书看客家女性尊长地位 房学嘉(73)

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 从多姓村到单姓村:东南宗族社会生存策略研究
- 以粤东丰顺县为例 曾祥委(83)
- 民国时期大埔县百侯村的水客、侨批与侨乡社会 肖文评(93)
-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周雪香(101)
- 上杭瓦子街:客家移民史上的闪光点 严雅英(110)
- 客家聚落发展与台湾交通建设之关系 徐金基(118)

番子湖客家村近 50 年来的环境社会变迁	温绍炳(128)
客家族群台湾西部山麓开发的经验	
——以六堆为例	陈国彦(140)

客家名人研究

黄遵宪的宗教观	
——兼谈他的趋时实用主义色彩	李海冬(143)
黄遵宪与排佛	张小聪(150)
林凤眠的艺术观研究	林运来(154)

客家民俗研究

客家人生仪礼中的中州渊源	吴永章(163)
宁都县石上村“割鸡、担灯”民俗研究	李 剑(171)

客家方言研究

试论历史上潮客方言区域的分界	吴榕青(179)
闽客方言与“脖子与下巴之间的部分”意义有关的本字	严修鸿(186)

活动动态

2005 年“海峡两岸青年学生客家文化寻踪夏令营”活动纪实	
..... 夏水平 严飞生 李海冬 张小聪	(192)
客家研究所 2004 年大事记	嘉 嘉(196)

客家群体组合和客家称名出现综述

杨 豪

客家群体既本在秦人汉裔这一个族群孕育,于此群体中派生,而他们在秦、汉时向南方迁徙,公元前 225 年当秦灭魏、楚、赵、燕、齐统一全国,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国,公元 206 年旋又转为西汉王朝统领之时,中原遗民便已迈出了南徙的步履。因而今天,当在议论这一客家群体的组合时,无疑都自当要追索到秦汉时大批军旅的南伐带动大批居民南徙,和三国吴后六朝由帝王南渡而带动了大批黎民南迁这两个关键时代。再具体一点说,便是要从中原遗民开始以同一宗姓,或本同一处原居乡村、地域齐齐作出南徙,其后都同在到达所居住地方或在侨置郡县中生存,从而组成了群体的那一时间中求索。

人类历史中生存和出现的民族群体,都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民族群体,在共同杂处中,通过彼此的通婚融合而最后组合形成的。其中彼此相处时所共识的方言,便是联系与带动群体形成、组合和发展的纽带。而秦汉时南方各地生存的原住民族居民为:正南方的两湖地区,是居有苗、蛮、荆楚和越等民族居民;于赣地区,是居有扬越、干越等民族居民;岭南和西南部地区,是居有越裳、西瓯、骆越等民族群居民;于岭南的北部地区,是居有仓吾、陆梁、南越等称的民族居民;东南与东南沿海地方,是居有吴、越与闽越等民族居民,等等。

迨东汉末年迄三国吴、晋、南朝以后,两湖地区已有武陵蛮、山越、瑶、畲、疍等居民或民族群就居;赣地已有山越、蛮、瑶、畲称族人就居;岭南两粤地有乌浒蛮、里、俚、僚、疍称的族群就居;于岭南的北部,主要有瑶、畲与山越;在东北部,则主要有俚僚、闽、畲、疍与蛮僚、侗僚等称的民族群就居,等等。

在秦汉和秦汉以后,当中原南伐、南徙的那些中原遗民进入到上述各处地方后,无疑都要分别与上述各地方中的原住居民杂处、共居与融合。由于各地方原本民族群体不同,加之当时从中原南徙遗民中又都分别有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山西、河北、河南及两湖诸不同地区,彼此从中原始迁时,便已互有了自己生存的民族、群体习俗与所操的方言特点,故进入到各地与各地方原住居民杂处、共居后,便都当要形成各具地方特征的、由当地流行方言所组合成的地方民族与其居民群体。

今据南方已经出现了的方言群体材料为例:于湖南,它已形成操湘语的群体;在江西,形成操赣语的群体;在江苏、浙江,形成操吴语、越语的群体;于福建,形成北部操闽北语,南部操闽南话、河洛话、福佬话的群体;在岭南形成中部操广府语,东部操福佬话,北部与东北部操客家话,沿海操军话,广西桂林、南宁等地操官话等等诸不同的方言群体。

上述这些方言群体,因各有不同的时间、地点与群体条件制约,故都非如铁板一块,始终不变地存在着,而是各有发展的许多层次。如像广府方言群,它从秦汉赵佗建南越国至近代几近 2000 多

年岁月的发展中,便都至少曾历经过秦汉时的越(粤)人称、吴后的广州人称和宋明后的广府人称这三个阶段方言群的发展层次;又如像福建闽南人、闽北人,也包括福佬人称的群体,依秦汉后闽北已有了汉代崇安汉城的保留,福州北新店村已有战国至汉的古城及秦至汉的 20 多座墓葬的存在,于霞浦、建瓯、南安、福州等地,又且保存有众多六朝墓葬,境中川流的一条河,且还称“晋江”,而《泉州府志·山川》载:“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入唐,王潮、王审知两位中原兄弟,又徙入该地称闽王。那中间已经徙入该地的中原徙民,秦汉始后,自又当都要经历秦汉,三国吴、晋、南朝,与隋唐宋后这三个不同时期发展的层次与其方言群体之形成出现。历史中出现的方言群体,始终不变是不可能有的。

本此道理,对于今行将议论的由客家方言所导引出的客家群体组合,也自当不可例外,亦同样都有许多发展层次存在着。

一、客家群体前后组合层次

以下,便以为众多专家学者共识、属于客家方言群孕育摇篮的粤、赣、闽这三省汇交处所得与所保存的考古、民族材料作出阐述。

粤北境中的连县、乐昌、韶关与南雄、始兴等地方在秦汉,是中原遗民自湖南越五岭溯湟川水(即今连水),或沿潯水(即武江水),与从江西入鄱阳湖、溯赣江、越五岭、跨大庾,进入该粤北部地方的三处通道所在。此三处通道,南宋淳熙年间曾在桂林任官的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一书,也明撰秦世入岭南越地通道有“自江西入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与“自湖南之郴入连”,和“自道入广西之贺”这三条。除此,《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曾在上述地方筑设“横浦、阳山、湟溪”三处秦关。汉时,犹“急绝道聚兵自守”于彼。其中的“横浦”关,同书索隐引《南康志》载,在“南野县大庾岭三十里”处(即今南雄北地方);湟溪即《史记》中的汇水,今日之连江;阳山关,即在今日的阳山境内。汉代元鼎年《南越列传》载路博德伏波将军南伐“出桂阳,下汇水”与“出豫章下横浦”,也都正是直接经由此地而往。

于此期间,秦时归附鄱阳令吴芮的梅钊,又曾在横浦南筑“中站城”;秦尉将任嚣与赵佗,则曾于乐昌地筑“任嚣城”与“赵佗城”;于乐昌的下游韶关,筑“汉城”,再下游的英德,复又筑有“万人城”(俱见《广东新语》、《岭南遗书》、《广东通志》诸籍),等等。

以上史籍经载这些事实,今见诸于考古发掘的材料:笔者与其他同仁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便曾先后在当地掘得属秦汉至晋、南朝、隋、唐、宋、元与明时间的墓葬以十和百数计,个别还发掘出居住遗址。这些考古材料,都具体佐证了典籍上所载诸项史实的存在。

如此,对秦汉后已入据该北部地区的众多中原遗民,无疑都已和当地秦汉时的陆梁、仓吾、南越和东汉末迄三国吴、晋、南朝后的武陵蛮、山越、瑶、畲、疍等诸原住居民作出共居、杂处、融合,从而组成当地不同时期的方言群体。

于粤东北境的龙川、五华、兴宁、梅县等地方自秦汉以来,从中原南徙遗民,他们从江西入粤和或经由福建进入广东,《岭外代答》也明撰有:“自福建之汀(即汀州),入广东之循、梅(即龙川、梅县)”这一条通道。正基于这样,笔者与其他考古工作同仁 50 年代开始,也曾于龙川发现秦代赵佗任该境县令时筑的“佗城”与当时所凿的水井遗址;于五华狮雄山,又发掘出有赵佗时代所筑的“长乐台”遗址;兴宁保存“秦皇坪”称名近处,掘得秦或汉时所铸供祭祀、宴乐时敲击的铜甬钟 7 件;梅县南口,曾掘出西汉陶樽与所贮汉代铜钱 8.5 公斤。进入吴、晋、南朝之后,各地又复曾掘出晋、南

朝至唐、宋、元、明时期的墓葬及其遗物；梅县等地且见有唐宋烧制陶瓷器的窑址保存。这当又具体证明该地秦汉以来，也曾是中原遗民南徙所居的一处地方；而中原遗民当时也确曾有过居址。因此，进入该东北部地区的中原徙民，在秦汉以后也当要和该地原居的闽越、山越、吴、晋、南朝人隋唐后，与畬、瑶中特别是畬这些民族裔民杂处、共居，由此并融合组成该地前后几个层次的方言群体。

秦汉以后，从中原南徙遗民，由于曾有秦汉随军旅南伐进入与吴、晋、南朝后随帝王南迁和吏官南任进入了两批：前者因南方地已归属于中原秦汉王朝辖领，故其遗民都多直接由两湖或沿赣地进入岭南；后者因岭南已归属南京建都的六朝王朝辖领，故其徙民，又见多从中原先抵江淮，后迁江左（南京）、江右（南昌），再转迁进入岭南。

由于遗民始迁时的地点、路线不同，其进抵岭南粤北与粤东北地和当地原住居民杂处生存时间，也有着或前或后；与此对所组合成的群体，便也要产生不同的层次。其中作为维系方言，亦不可能前后都始终是同一个类型或完全相同。如今天闽西北宁化一带地方的方言，据有关人员的调查，同样是客家话的方言便有 34 种，这些客家话，可分为彼此能够互通的与彼此方言殊异不可互通的两类。在广东普宁南阳地区也见这种现象，即该地区居民所自称也是客家话的，相邻的客家河婆人与梅县人却又都听不懂。这种现象，也见于和中原遗民共居的其他居民之中。比如瑶族，其作瑶称的族群亦有达 20 多种，其中在粤北生存的排瑶和过山瑶，彼此方言互不可相通；作畬称的，梅县有畬坑，兴宁有坪畬、大信畬，五华有登畬，平远有黄畬，蕉岭有蓝畬，大埔有上畬、下畬，以及惠阳、博罗、增城、潮州等地作畬称的，其数也足数十种。而彼此所操方言，潮州、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畬人操的是融合有客家话或者便是客家话；而博罗、惠阳、增城、海丰等地畬人操的，则是瑶族的布努语，即也出现互不能相通现象。广西的壮（即僮）人，北部生存的称北壮，居南部地方的叫南壮，其中南北两地壮人操的，都互有自己的方言，因而彼此也同样是互不能相通。又再如海南岛的黎族，其生黎与熟黎称的，其支系中像侏黎与美孚黎称的，又彼此各有各的方言。笔者 60 年代以前进入该黎区，发现没有一支方言能够贯通各个支系群体之中。这种现象都为什么？何故？原因很简单，便是民族、群体在杂处、共居中已各有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方言融入，迫使了原有方言各自杂化、异化所得的结果。

本此道理，下面试析粤、赣、闽三省交汇处的客家方言群体的形成组合。笔者所持观点，是客家方言群是多元抚育与多点组合形成的，绝非如今天有人只提“宁化是客家祖地”，“汀州的汀江是抚育客家人的母亲河”那样，把客家群体本是生机勃勃、活力鼎沸的历史研究，硬引入单一的狭隘胡同。以下重点选择粤东北和粤北两处地方保留的考古与民族材料进行论述。

二、粤东北之群体组合

粤东北地方以梅县为中心，秦汉特别是汉代以后中原遗民已徙入该地，今天该境保存的考古出土材料都已作出了确认。进入到三国吴、晋、南朝后，20 世纪 50 年代笔者在该地考古发掘时，又曾在梅州中学校舍背面开筑通车车路和大基岌岗上原高级中学开筑校舍地段，先后发掘出晋、唐两个时代的墓葬，并具体掘得青釉瓷唾壶、青釉瓷鸡首执壶残嘴、青釉瓷罐、碗、盘等诸随葬器物，晋代墓砖上有刻的“太始八年八月十六日作此壁”，和唐代墓砖上刻作的“神龙元年”等记年砖文。其中“太始”即“泰始”，古汉语中“太”通“泰”，是晋武帝司马炎建晋代王朝（即西晋）时所立年号。“八年”为公元 272 年，“作此壁”便为指建此墓葬。“神龙”，是唐中宗李显帝复辟时的一年号，“元年”，为公元 705 年。南方汉代以后兴行墓葬，凡属用砖砌结的，因砖事前要雇工烧制，故建该类墓葬的人，都

多是生前已掌握相当家产之强者；于墓砖上刻作卒葬年号，则显示死者系属正统观念很强的当朝官吏或是豪右之类人物。

依南朝沈怀远《南越志》载，东晋义熙九年在义招县（今大埔县）设有“流人营”。梅县地方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引《图经》载，赣、汀两地居民当时有“侨寓”该地负责农耕生产，“侨寓”便是指在侨置郡、县中生存的侨人。这些侨人，再查《南齐书》上之“流民多庇护大姓以为客”之说法，也是指称客人。

这些人依《晋书·地理下》：“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北史》：“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当时的王朝与地方上的豪强，均曾派遣吏官或是豪右管领与抚镇他们。上述发现的墓葬主人，可能便是晋至唐代在该地具体领导这些流人、侨人、客人们的“父母”官员。

与此同时，梅县“畚坑”境内，在一座南朝墓的砖表面，又见用木、竹或骨支条划有“畚人”文句三组；另一块砖表面，则用手指头划书有一组“兴畚”文句。保存这座南朝墓的境内，其作“畚”称的地名，还见有孔畚、双螺畚、周屋畚、坪顶畚、叶畚、下畚、白畚、侯畚、铅畚，等等；再，该地居民中至今又尤且保存有祖传一种耐旱稻种“畚禾”。故此可见保存该“畚人”文句的墓葬地方，当非偶然之地，而本该是该一支畚人族群曾居此和于此发祥事实的见证。

今天史坛对畚族人研究所据材料，最早为南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中之载潮、漳、汀接壤处之“峯（即畚）民群集”与刘克庄《漳州谕畚》中所载“畚民”这些材料。若再上索，凭杨澜《临汀汇考》载畚民：“唐时初置汀州”，“今汀人呼为畚客”和闽、粤、赣三省汇交处出现“蛮僚”、“峒蛮”，《云霄汀志》之载“总章二年（669）蛮僚啸乱”，也是指称畚人。所见最早的畚人材料，也只是唐代初、中期。而今梅县畚坑南朝墓砖上已出土了“畚人”文字，无疑已是畚人研究当今最早的一份材料了。

凭依这一份最早出现的“畚人”材料，根据当地三国吴晋后的侨姓徙民于西晋初期那时起已有徙入该地就居事实，这又自当说明：晋代起后到达那里的中原徙民，也都已曾在该境与那时生存于此的原住畚人进行了杂处、共居与融合。

历史中不同民族、群体的融合，都是以互动与互融形式进行的。比如今见于南朝墓砖上作略带隶书韵体的“畚人”文字，凭笔者积数十年考古所得经验，作此划书的作者，当本是负责制砖的畚人自己。南方包括畚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他们历史上都没有汉代这样的文字兴行，而今墓砖上见有作此，这当具体说明畚人在与侨人杂处、融合中，已从侨人群中学习到掌握了汉族的文字与其带隶书体的书法文化。

关于畚人的族源，今天史坛有他们是越人的后裔、武陵蛮的后裔与徐夷的后裔等说法。然而历史上以越和蛮称的族人，都是习惯有名而无具体的姓氏，东汉时居当地的山越族人如此，后来以俚僚与蛮僚称的僚人。按《周书·异域上》载，也复是：“俗多不辩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亦是如此，也是循家中辈数作出言谓；再就见于《史记》、《汉书》等书籍中有载越人之吴阳、吴芮、毕取、居翁、驹力敖、越王摇、无诸、郢及丑等称的，也都同是名，而非姓；就是闽越中所载“姓驹氏”，凭《集解》解：“徐广曰：驹，作骆”。其实际中指的，也都仍旧非姓，而系族群——即对骆所作出的一种认称。

再对于历史上有见称的姓氏，按《说文》释：“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是本源于母系为中心时的氏族社会。因而古代最早见称的姓，如姚、姒、姬、姜、妫、嬴、姁、姁，等等，便都从女而书。而氏，则继母系氏族社会之后于父系部落中产生的，故像古代帝皇之见有称作伏羲氏、高阳氏、陶唐氏、有虞氏，等等。及后这种姓氏，依《左传》：“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

官族；邑亦如之。”始才出现以族等称氏，而且还由天子负责赐姓氏，如鲁公儿子无骇的字是子展，故隐公便命其后裔为展氏。对有官者，又可以官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等等。对有技术者，同样亦可赐氏，如巫、屠、甄、漆、雕，等等。对已有采邑者，亦同样可以赐其邑为氏。这些姓氏，《通志·氏族略·序》郑樵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这也便是上引南方民族习惯有名无姓之一主要缘起。

基此，中原的华夏民族、汉民族，便一直有着此种姓氏的袭传；而南方的诸蛮，如郑樵所说那样：“坠命亡氏，路（即灭亡）其国家”，则仍旧以神祇比拟姓氏即行其图腾信仰膜拜习俗为主。

然而，在今梅县生存的畲族人，自经过和中原汉裔流人、侨人、客人杂处融合后，不少史料已载他们有了雷（卢）、蓝（林）、茅、赖、盘、苟、姜（刘）、胡、侯、钟等 10 个姓氏。这又明显说明姓氏一俗，在该族群与汉裔客人的融合互动中，也已被畲人所接受，已经成为他们实行的一种姓氏习俗了。

对所操方言，南朝至唐时畲人操的是何种方言类型？今人已难得知晓。然而，今天按潮州凤凰山畲人保存的，已是“客家话约 90 - 80%，潮州话 10 - 15%，还有 5% 则既不像客家方言，又不像潮州话，而是具有一定民族特点的单词和词组”（《潮州文物志》潮州畲族语言条）。在浙、赣境之畲人所操的：“其语言已十之七八和客家语相同”（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对居闽、浙、赣边境畲人操的，又“是汉族的客家方言”。^① 畲人在与客人融合互动中，很明显，又都已把客家人所操方言接受为他们自己的方言了。

与此同时，对畲人保留固有习俗——如众所周知的盘瓠（即狗）为祖先信仰膜拜习俗，当畲人在从事陶瓷制作生产时，凭畲坑所出唐代墓中随葬一件带青釉色的三足瓷罐显示：所作三足，中原与其他地区。本多习惯作成柱足或蹄足。然而于此，却既非作柱足或蹄足，而是作成一种爪足，即作似盘瓠的爪足。又如客家地区以往小孩头上戴的“狗头帽子”：前设额栏，两侧则各凿一耳朵全包住头颅造型，明显是模拟狗首而来的一种制作，亦是畲人崇拜盘瓠观念的一种产物。其后它的制作者与持有者，却已非再是畲人，客人和其孩子也有了该种形制。显然，对畲人固有的观念习俗，当客人在与畲人融合互动中，又融入到了客人群体，以至成为畲客双方所共同承认与拥有的东西了。

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民族融合和互动，承前所述，凡融合中人数居多，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力量又都一直占有较强盛优势的，往往都会成为融合互动的主导、核心，主宰一切事物的发展和运动；反之，人数居少，而政治各方面又不占优势的一方，从民族到习俗以及方言各方面，便都会从此而遭到融合混化，最后变成弱小的一方，或是从此消失，或另辟他处去保存。

而今梅县地方原居的畲族人，自晋、南朝经唐于梅县发育和与侨人、客人杂处、共居融合后，因侨人、客人都是当时的强盛一方，故发展到宋迄明代后，都不能不融入到客人的群体中去，并且成为客家人的一员；其间若否，则只好向梅县外围迁徙了。

正由于此，今天梅县地方，亦只见畲称地名的保留，不再见畲人的生存；对原畲人有着袭传的 10 个姓氏，除苟、茅、盘等已经鲜见或者不再有传外，其余都已自称是客家人所操的姓氏；对畲坑原地保存由畲人所培育的耐旱稻种“畲禾”，而今也已成为当地自称客家人所掌握的稻种，不再称是属畲人的“畲禾”了。

对那时已经迁出梅县地区的畲人，他们以“山哈”、“山夏”自称。其“哈”与“夏”称的，也是客方言的“客”，即也自称做“山客”。见于当时民族学者的撰述有：明朝谈孺木《枣林杂识·和集》载有：

^① 罗美珍：《民族语言》，1980 年 1 期。

“汀人呼之畚客。”明朝邝露《赤雅》也载：“瑶名畚客。”即于“畚”称呼之前给贯有“瑶”(即瑶),即“瑶畚”。于此“畚”后又给缀有“客”,即称“畚客”。其中给贯“瑶”,是缘于瑶与畚都大体于三国吴后孕育而成和出现,彼此又同有对盘瓠的信仰崇奉;其给缀“客”,则是明谓畚人自经过和“客”融合后,相沿至明代,已袭传了客家习俗,亦已能说客家话方言即都客化了,故便也称“畚客”了。

这些便是粤东北地区晋、南朝迄宋明以后,其侨人中的客人与当地畚人杂处、融合后共同组成客家群体的大体概貌。

三、粤北之群体组合

对于粤北境的情况,今以韶关为中心,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广州等地地还未被日寇占领,珠江三角洲境的广府民系居民也还未有大批向粤北以曲江(即韶关)为中心地方作出内迁之时,该境生存居民,除本有武陵蛮、山越与后来的瑶、畚、蛋等诸原住居民外,可谓清一色操客家话方言的客家人氏。其中今为众多研究客家学学者推举最早见出岭南之客家先民张九龄,便是唐时诞生于粤北曲江始兴地方。以下围绕着张九龄所代表的一族,探索该地区客家方言群体的组合与生存情貌。

客家先民张九龄,是唐玄宗时代一位德才兼备的杰出丞相,著名的政治家、大诗人,也是岭南地方最早参与中原封建皇朝中枢决策的人物,所著《曲江集》亦是岭南最早流行的一本集子。

他一生从政都守正不阿,直道而往。任职丞相时,因曾规劝李林甫丞相与提斩安禄山等事而令帝不悦,兼之李林甫的作梗排挤,致被罢去了丞相职,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此后,便息政亡卒异地。越年,才由其子张拯迁回韶关曲江罗源洞他家族的墓地安葬。

及后,安禄山谋反,玄宗逃亡四川,始识悟丞相贤才,痛泣之余,旋便遣特使奔韶致祭。还重币恤其家属,给谥号“文献”。于唐朝,可谓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了。他所葬家族墓地,至20世纪50年代,除还保存有本人的墓外,尚有胞弟张九皋与张九章两人的墓葬。其后,张九龄墓遭盗掘破坏,60年代初,笔者普查文物发现时,负责作出发掘清理。今凭墓中随葬墓志铭中有见刻:“其先范阳人,四代因官居此地。”“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七日薨,二十九年三月三日迁窆于此,韶江”等文句,从中得知:

他本是中原河北范阳(今北京城西南)籍人氏,后因前代先祖在岭南任官,才成为岭南今天粤北曲江始兴地方的一员客家先民。在曲江的生年,凭墓志铭所记“开元二十八年(740)”死时是“六十有三”这一个岁数往上推索,应当诞生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按他先祖四代都在岭南任官,一代以60年计,四代便已有了近240年之久。而隋代历37年,南北朝存在170年,240年这个时间已届临东晋迄南朝了。因此,对他的先祖当年到岭南任官,既可能直接受到南京建都的皇朝令遣;又该本出于当时南徙中原人侨姓中的一员裔民。到岭南,也都大体是沿鄱阳湖入江右路线,进入南雄后,再为下曲江今址就居的。他们自东晋、南朝经抵粤北曲江后,无疑也都要与当地原住居民或武陵蛮,或山越,或是瑶、畚、蛋等族人杂处、共居与融合;到张九龄生存年代,又当要与在该地的瑶、畚、蛋人特别是瑶人共居,组成以操客家方言为主的群体。

唐代的张九龄,今人称他是客家先民,主要理由大抵有三点:其一是他当时生存地方本就是客家先民一直踞居之地;其二是他居地近处的翁源蕙茅明朝弘治元年(1488)所建的八卦形围屋,兴盛时住有400多户共1700多位居民,他们全是姓张,也同是操客家话这一方言,于祠门石柱上所镌楹

联,明刻说:“千秋事业承京地”,“十策家书继曲江”。^① 此中“曲江”便是张九龄于曲江诞生时所取的别名,也即此围屋中居民都是操客家话的张九龄后裔;其三是远迁去马来西亚檳城任华侨总领事的清光绪年间张弼士居房门楼上方,也同立有“曲江衍派”四字的牌匾。“曲江”承前所述,也是张九龄别号,而此位张弼士原出生的大埔地区,也本是操客家方言的客家人地区,而今他自认是“曲江衍派”,也当说明他也同是张九龄的子孙。

这样,从张九龄原居住地到外围已作他迁的子孙,都同称是张九龄的一支裔民,又且是同操客家话方言与同称是客家人,那作为张九龄本人和他的先祖,便没有理由不本是属操客家话方言的客家人了。

这也便是粤北地方自晋、南朝后客家先民和客家人生存的大体概貌。综合上面所引的两则材料,对客家这一群体组成,于粤东北和粤北两处地区,无疑自秦汉起后由秦汉徙民与当地原住仓吾、陆梁、南越、闽越等诸“百越”称的裔民组成群体;进入晋、南朝后,又由中原的吏官,侨姓的士族,或豪右等徙民,在秦汉已经形成、出现的群体基础上,与那时地方中出现的武陵蛮、山越、俚、僚或是瑶、畬、蛋等族群融合,组成其第二层次的群体;待再入南朝至隋、唐、宋后,以流人、侨人和客称的徙民,在粤东北当主要与畬人,于粤北则主要是和瑶人共居融合,为客家群体组成第三层次。中间对客家方言群于徙途中的真正出现,则当始于南朝至隋唐这一时代;入隋唐宋,其客称群体当已完全组合形成。

对两地间所操的方言“畬”,从文字出现上说,《周颂》、《周易》、《尔雅》、《说文》等籍都早有了记载,出现时间较早;但给“畬”后缀“人”,即形成“畬人”与称“畬族”,今有人研究,是缘于山越与或武陵蛮群体的衍发,但梅县畬坑南朝墓砖上出了“畬人”这份最早的材料,此一梅县畬坑发现地,也当是孕育该“畬人”之一处发祥地;于梅县外围和在粤、赣、闽、浙境中就居的畬人,该便是从此畬坑地方逐年逐次外迁遗民。“瑶”,《梁书·张瓚传》作“莫徭”。《宋史·蛮夷列传》载:“名为徭(即瑶),而实不供徭役。”所称本缘出历史中该民族不向地方政权缴交赋税、徭役的特殊行为;称“莫徭”,《隋书·地理志》又载说:“自云其祖先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对它之出现,《三国志·吴书》直接载有“由(即瑶)邑侯君长”句,也当六朝时便已有了。对该瑶族人的族体孕育,今天有较多说法,谓是源出于武陵蛮这支群体。而瑶这一族群,如前所述,尚有许多支系,其中的方言保存,也不尽同属一种性质。

凭此,面对畬与瑶这两支族人所操的方言,既然本不同出于同一个群体,那由此而与侨或客人融合时所形成的客家方言,自当也不可能尽同一个模式。即在粤东北与粤北两地流行与所保存的客家话,都是互有差异。依笔者当年在该地方用梅县为中心的客家话方言与曲江为中心特别是张九龄故居——始兴地区保存的客家方言交谈时,便不独发音见有差别,而且个别的言词与使用取义,也不全为一样,甚至还出现了上面有引闽西宁化与广东普宁同称客家人而所操方言都互不可谳晓的现象。

四、闽西宁化一带之群体组合

对于闽西的客家方言群体组合,今闽西已设“客家祖地”的宁化石壁一地为例。历史上宁化石壁地区的原住居民,依《礼记·王制》中“南方曰蛮”载句,远古时当本居有一支以“蛮”泛称的民族。

^① 邓国庠:《神奇的蕙茅八卦围屋》,《广州日报》1995年10月26日。

此蛮，《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贞《索隐》云：“蛮者，闽也。”其居东南方福建境的，是一支以闽称呼的族群；到秦汉前后，《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即以“闽”称的族人，又明确冠有“越”这一称名。基此，宁化石壁处秦汉以前和秦汉时期所居的土著、原住民，都应该本是一支以闽称的闽越族人。

由汉至晋，汉武帝统一南方的南越与闽越，为图灭掉“悍”而“数反复”的闽越，武帝便采取“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①即采取迁移闽越族人去江淮地区生存的政策，这样便出现了“东越地遂虚”现象。已虚之地，除仍有一些“其民不从者复生聚”外，^②其余大部分居民都已纷纷逃入深山老林去了。经东汉至晋，在粤、赣、闽三省交汇的地方，依《资治通鉴·汉记》胡三省注：“山越，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便出现有一支以山越称的族群。由此，该处地方的原住民，亦当已有了山越族人。

迨晋迄南朝、隋、唐，《资治通鉴》载：“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唐记》卷259）。薛凝度《云宵厅志》卷十一也载：“（唐）总章二年，蛮僚啸乱”。其原住民中，又当有以峒蛮或蛮僚称的居民踞居着。

与此同时，宁化石壁地方尚有不少畚称地名的保留，如宁化城东镇有上畚，济村有上畚、下畚，永丰中沙坝有杨畚，新村安乐有赖畚，七区寺背有田畚，安远有割畚，治平有良畚、田畚，水茜有洋畚，店上有枫畚，等等。那该地起码于唐朝期间，又当还有“畚人”称的族人的存在。

由宋至元，依《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载处州南山洞置汀州时谓：“以领长汀、黄连（今宁化）杂（新）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于宁化境，该还杂处有山都与木客称的居民。

其早期称的闽越，便是南方典籍屡有载述的百越族群中之一支族群，也是秦汉以前和秦汉时期即居于福建境的早期原住民。对继后作上述这许多呼称的原住民，其中：

山越，《资治通鉴·汉记》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它是东汉从闽越族群中衍传的一支越族裔裔。

峒僚与蛮僚，梁绍猷《南海县志》曰：“岭表溪峒之民，号曰峒僚，古称山越。”（《杂录》卷35）。光绪温仲和辑《嘉应州志》亦载：“峒僚（即僚）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卷三十）。即泛指山越。

畚族，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载：“按畚徭即古代所谓山越。”即其中见以峒蛮、蛮僚、畚族称的，也是与古百越中的闽越，后来所衍生的山越，互有民族亲缘的关连遗民。

山都，乐史《太平寰宇记》引《异物志》载：“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儿女，不知其源绪所出，发长五寸而不能结，裸身，见人便走避之。”《太平御览》引邓德明《南康记》又曰：“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长毛。”引《述异志》复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身，赤目，发黄披之。于深山树中作窠。”据此，以山都人称的，显然大体是汉至唐间沿海上“陶瓷之路”徙入岭南或作黑奴贩运的异邦昆仑奴、番人（或番奴）之裔民。

木客，凭刘禹锡所作《莫徭歌》中有“婚姻通木客”句，所称木客，明代邝露《赤雅》又载：“自秦时造阿房宫采木，流寓于此”，即他们本是中原秦灭六国后遭到秦始皇南遣，从事伐木建造长安阿房宫之原六国一支遗胄。显然所称，也非当地的原居土著。

凭此，该境秦汉和秦汉以后，其见以秦人、汉人称的中原徙民，三国吴、晋、南朝后先抵江淮，后

① 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② 陈文衡：《龙岩州志·封域志》。

入江左、江右的以流人、侨人、客人称的及其吴地中的土族、豪右、吏官等徙民，他们经抵达该地后，自当都要与该地生存的上述原住居民杂处、共居、融合，组成各时期中的方言群体。今依当地已有的考古材料和史籍已有载述的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据刘善群《宁化县志》载：今宁化境的翠江两岸和江背、横锁乡等台地地方，都有着古代居住遗址与其遗物保存，出土有磨制的石镞、石斧、石铤、石刀（犁刀）、陶纺轮，与拍印篮纹、席纹、方格纹、雷纹和米字纹、剔刺纹等纹饰的印纹硬陶残片，及基本完好的篮纹黑陶釜、方格纹灰陶壶等物。

在石壁“客家公祠”后座陈列照片中，也见有黄连所出的镞斗，与侈口、斜肩、榄形腹、平底的方格纹陶罐等物。

《县志》记载，该境又曾出土称商周（其实是唐代）的海马葡萄纹铜镜；宁化第六中学校园内出土有唐代刻“长沙寺”、“唯大唐总章元年八月”、“戊辰造、己巳□葬”诸文字的砖室墓；泉上镇的水库一带，城关、济村、泉上镇的谢坊村、安乐乡杨家大队附近，和湖村乡中坑村旁等地，还出土和保存有唐、宋至元、明、清时期所烧制的青釉、灰黄釉、白釉、黑褐釉、红赭釉暨青花等陶瓷器皿，与烧制陶瓷的窑址，等等。在安远，曾出有秦、汉至隋、唐、五代时的铜（铅）钱币近 30 公斤。

南方流行磨制石质工具，考古界均订作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石器以磨制斧、铤、凿、镞为主，陶器多见夹砂粗陶与泥质软陶，纹饰以绳纹、篮纹、席纹、方格纹为常见；晚期石器除保留上述磨制外，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磨制而成的戈、矛、匕首等石器，陶器也以泥质硬陶系为常见，纹饰除上述相同花纹外，又出现仿商周青铜器铸纹而来的雷纹、蚪纹（原称夔纹）与米字纹等诸纹饰；而且往往还见铜器共存。因而此一晚期，学术界便有称作几何印纹陶或印纹陶文化遗存。对两者的出现与流行时代，早期的有谓距今五、六千年至上万年间流行；晚期的则谓在 2000 多年至 3000 余年间中保留。而今见于宁化境保存的，都属于晚期性质的印纹陶文化遗存。●

其具体流行时间，以保留磨制斧、铤、刀等石器为例。广西贵县卖牛岭与桐油岭的西汉墓内，江西永新文竹的东汉墓内，广州象岗山的西汉初期南越王赵昧墓内，均有保存。其中赵昧墓出土了 6 件磨制的斧、铤。

像米字纹的陶瓷器，除南越王赵昧墓出土有米字纹的陶罐等器外，闽北崇安所掘西汉汉城的瓦当上，湖南营浦（今道县）、舂陵（今宁远）、南平（今兰山）等县所掘西汉的故城，与江西鄱阳湖西北汉高帝时的豫章郡鄡阳故城所出的陶器上，广州秦汉遗址的陶片上，五华狮雄山汉代台城遗址所保留的陶纹上，也都同样见有此种米字纹的刻划、拍印保留；于广东郁南与高明两地所出瘠尸陶瓮葬具上，还以两件为一组合葬，中间一件通体拍印米字花纹，而另一件，则拍印秦汉南越国时期所风行的方格纹上加拍戳印纹的纹饰。凭此，今于宁化境保存的上述印纹陶，当明显是属晚期秦汉流行的印纹陶遗存；境中保存的篮纹黑陶釜、方格纹灰陶壶、镞斗，和长汀、河田乌石寨等地所出铜铤、铜鼎、铜刀布、铜半两钱、铁刀、铁剪，和石壁“客家公祠”后座陈列照片中的侈口、斜肩、榄形腹、平底的方格纹陶器等项，也是同属秦汉特别是汉代期间流行所遗器物。

对于器物的持有者（即该一文化的原主人），还可从所出米字纹作以下勾探：

米，与春秋时出现古写文字的𪛗，同发 mǐ 音。《史记》中《索隐》宋忠释：“𪛗，羊声也。”《说文》释：“𪛗，羊鸣也。”即同释作羊的鸣叫声。《国语·郑语》载：“融之兴者，其在𪛗姓乎？𪛗姓夔越，不足命也。”《史记·楚世家》亦载：“六曰季连，𪛗姓，楚其后也。”即所云当本同属一个姓氏，而且还是黄帝子孙，高阳的遗裔，春秋楚国王族的季连所曾有举称的一个以国作出的姓氏，那时凡属楚国的王族，“楚其后也”，都是同属操此姓氏的后裔。

今依此𪛗与米两字都同发一个音的事实,战国后作此𪛗书写的字已经少见,多见已是此种米字,如河南郑州所掘的战国晚期空心砖上,陕西秦代都城的咸阳故城所出的陶砖上,都见有刻此米。而此米,依《广韵·齐韵》载:“米,胡姓。”《通志·氏族略二》载:“米氏,西域米国胡人也。”即所称又复同是指姓氏,也言其国家。即亦属原楚人曾操的一姓氏,这时已有了胡人之融入,并形成是胡人的一个宗姓。

据此,对今见于南方印纹陶中作该米字表现的纹饰,按春秋作𪛗书写时《国语》的“𪛗姓夔越”句,其“𪛗姓”的“夔越”中,是分有“夔”与“越”两支族群。其中“夔”,便是春秋楚国熊绎的六世孙熊挚在夔城建夔子国时之遗民。当年的夔城,在今天的湖北秭归,所建的夔子国,又称隗国、归国;而“越”,便是居住南方的越人了。《史记·赵世家》中《世本》载:“越,𪛗姓也,与楚同祖。”其中居于岭南地方的越人,同书《索隐》引《舆地志》云:“南越及瓯骆,皆𪛗姓也。”见居福建地的,《国语·郑语》亦载:“闽,蛮矣。”《史记》、《索隐》:“蛮者,闽也。”见居江浙吴国的,《国语·吴语》也载:“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姓𪛗。”即包括岭南在内的南方越人,亦同是属姓的子孙;待战国末迄秦汉此一米字盛行时代,依中原河南郑州的战国陶空心砖与陕西秦都咸阳故城的陶砖上都分别有此种米字,及后两湖的战国至汉代时的陶砖与陶器残片上也复见有此米字,显然也是从中原,经春秋楚国而传入到南方及闽西地的一个姓氏。根据秦汉特别是汉代时的这一制作已经广见于南方各地,而且广东郁南作瘞尸的米字纹陶瓮葬具里且直接随葬有战国至汉时间的铜铸矛、镞与匕首兵器,充分证明死者本是一员军旅,而战国末至秦汉,也正是秦国向南方发兵征伐时刻。如此,对宁化(也包括整个闽南以及岭南地方)出现、保存带米字花纹的印纹陶遗存的主人,无疑是一批具有楚越民族亲缘色彩的中原徙民。他们,亦当是秦汉前后闽西与宁化地区原闽越族遗民(包括后来的山越)与那时从中原徙入的徙民杂处、融合历史之具体见证者。

对于“客家公祠”后座陈列照片中那一侈口、斜肩、橈型腹、平底的方格纹汉代陶罐,赣州南郊所掘一座汉代画像砖墓中也曾出土一件基本相同的陶罐,^① 这又证明上述南徙的中原军旅和居民,当时都是直接沿着从赣南入闽西宁化通道而进入该境就居的。

所见的唐代纪年砖墓,古人用砖建墓,前节已述,因砖需动用众多人力、物力和技术去炼泥、结窑烧制,对原住民和汉民中的一般百姓徙民,无疑是一种奢侈品,在生时亦当不敢轻率用之建房;就是死了,也以筑土穴、土圻为俗了事。故此,这类砖墓在唐宋以前,按笔者从事考古发掘数十年的观察研究:稍大型的,墓主人多属地方官吏、豪强(包括其家属)阶层;砖上加刻纪年(如宁化唐墓刻“大唐总章元年”纪年)的,这是封建社会正统观念影响强烈之作,又当是官吏、豪强人物莫属。于砖中间刻有“长沙寺”与宝塔、莲花花纹:寺与塔均属佛教建筑项目,寺是佛家建筑固有称呼;塔为佛教徒圆寂后葬尸的墓塔或藏经之塔;莲花本属一“出污泥而不染”植物,佛家也有作净土比拟,因而佛主坐的,亦有作成莲花形而俗称莲花座,所诵之经,也有称莲花经。故墓中作此,无疑都是墓主人崇佛的一种观念反映。然墓中所作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呢?则属汉代道家所行的四神(或四灵)信仰图腾,既同出此墓,当表示墓主人有崇信道教观念存在。这种现象,我国释、道盛行到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时代,于笃信佛教同时,又有混杂尊奉玄学习俗。这种事实,唐至宋以后寺庙,也一直见有保留反映。故今宁化唐墓有此两种信仰,当不足为奇,这是墓主人佛、道两教信奉的反映,也是当时宫廷和官场吏官信仰之一种写照。

^① 《文物》,1982年6期。

所见海马葡萄铜镜,海马是海中生物,葡萄为西亚乃至西欧居民普遍种植的一种农作物,铜镜上铸此纹,本非我国汉民的习惯喜爱,应该是唐代海外通商贸易者所引进来的制器。唐时已很为流行,而且也多见随葬入墓内,今宁化这块,也当是唐代墓中随葬的一件遗物。

所出近 30 公斤的铜(铅)钱币,最晚期的是五代南唐李璟交泰二年(959)所铸“唐国通宝”钱币,故是五代末至宋代间该地出现动乱时由持者私埋入土的一批遗存。

对唐至宋、元、明时瓷器与烧制瓷器的瓷窑发现,是该地区自唐宋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陶瓷生产有了长足发展的一个实证。其中唐宋时期的青瓷器特别是宋代以黑釉和红赭色釉做成的微圆腹、矮圈足的碗属(又称瓷盏),依笔者考察,宁化以南之汀州近郊,潮州的笔架山,惠州的梁化区,和广州的西村等地,都同样有此碗属瓷器成品及其瓷窑的保存。跨出闽、粤南海,于马来半岛的马来西亚马六甲、新加坡,印尼的苏门答腊与爪哇等海岛,同样也见有不少保存。其中马六甲靠近苏门答腊与新加坡南部海域,不少中国沉船,也打捞起众多这种瓷器。新加坡的一位中医医生兼收藏家,便曾以罗筐作单位收购这类出水碗器,这都说明该类瓷器是唐宋时期外销的商品。而这种外销商品,凭汀州南一条汀江河可以经大埔而直出潮州入南海,那于宁化、汀州一带进行的该类瓷器生产,自当也可以和外销商品挂上勾,促进当地的瓷业生产兴旺发展。

对其中的生产者,今依梅县畚坑一座南朝砖墓上“畚人”文字的刻书,说明划书此文字的畚人正是砖块的制造者。如此,畚人在南朝也当能从事陶瓷生产。故今闽西与宁化生产的陶瓷器,虽没有完全证据说明是畚人制作,但起码他们都已参与了这项生产,这大致可以确认。

以上这些考古材料,虽然还很零碎和不完整,但却已有力见证了唐至宋代当地居民生存和生产的历史真实。

然而唐宋以前三国吴至晋、南朝这段时间的呢?当地这一段时间的考古材料都明显得很短缺。这是为什么?原因在该境中原徙民自秦汉入徙该地后转到吴、晋、南朝已减少了或已终止了迁行动;直到唐宋以后,始又重燃迁徙热潮。个中道理,秦汉时中原人南徙,是出自军旅南伐,缘于政治原因;而在唐宋该境又出现迁徙热潮,同样也是起于军旅行动,同是缘于一种政治原因。

众所周知,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因为“靖边方”,中原派曾遣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进伐畚人起义居地,那时跟随陈政进入的人,有谓是“府兵三千六百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福建漳浦、云霄等地)地方相视山源,开屯建堡”(《云霄厅志》)。那时由宁化至清流九龙江,正是陈政、陈元光父子屯兵的地方。及后,漳州、汀州畚人居地,还设置了郡治加以管辖。迨乾符三年(876),又遇黄巢于冤句(今山东菏泽)起义,所率近十万众的中原人,渡淮河,经浙江入福建,占福州,攻广州,以及北上取长安。复再掀起几乎波及全国居民或从军或避乱的迁移大浪潮。

再转唐末、五代,中原河南光州的固始人王潮与王审知兄弟,乘黄巢动乱,于光启元年(885)三月,率中州河洛一带居民组成部旅,沿赣州进入汀州和漳州,占据泉州与福州,王审知本人还因此被封为福建观察使;迨梁,再封为闽王,雄霸福建全境。

由宋元至明,宋景炎元年(1276)元军进攻浙江临安(今杭州)南宋王朝时,宋臣陆秀夫、张世杰护卫南宋末代皇帝赵昰、赵昺逃往福建,号召群众抗元。同年十月,元将阿剌罕攻入汀州,文天祥率领官兵奋起抵抗;原泉州掌管市舶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暗中通元攻宋,逼使南宋王朝转向粤东梅州、潮州方向逃移。文天祥是江西吉水人,据《宋史·文天祥传》载,曾“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水兵,有众万人”,转战于赣、闽、粤边境之间。

这样,随着军旅征伐与地方官民的起义,百姓受征被调充作劳役事件迭,势必促使各地居民无止境的迁移、流徙和组合。象河南光州固始陈氏父子率河南官兵入闽后,今漳州、潮州一带的陈、林、黄、郑等姓,便谓是随陈氏父子而至的;唐时的王潮、王审知兄弟从河南河洛入闽,泉州一带也留下有操河洛话的中原遗民。再如今宁化石壁“客家公祠”中供奉 151 支姓氏中之巫、温、刘、赖、吴、黎等姓氏,其后裔世代相传:巫姓中的巫罗俊,是唐太宗时奉令驻守南疆,始居福建宁化黄连洞;温姓中的温铜宝,因避唐僖宗时之黄巢乱,始从赣南石城迁居福建宁化石壁乡;刘姓的刘天锡,亦于唐末僖宗乾符二年弃官奉父翔(祥)时避居于今天的石壁洞;赖姓的赖德生三子,也是在唐贞观时才播迁于闽,然后再于宁化、上杭、永定等地散居;吴姓的吴竟后裔吴宥,也是后来才迁居福建宁化;黎姓的黎干官京兆尹,经过官掌赣南虔化县令后,才徙入福建宁化居住等等。

综此,对闽西宁化乃至石壁境内的中原遗民与客称的客家人之人徙当地,自秦汉有徙后,明显是唐至宋后复有继续徙入,因此始与当地蛮僚、峒僚、畲人原住居民杂处、共居,组成当地操客家方言群体,其组成时间,亦大体发生在唐末至宋代,比之粤东北与粤北的中原徙民自晋、南朝即开始与畲和瑶原住居民杂处、共居组合群体的时间稍晚。

五、赣南一带之群体组合

对于赣南的客家群体组合。江西的中、南部,秦时为南野地,属九江郡辖领。公元前 214 年,当秦遣尉屠睢“一军守南野之界”时,境中即已成为中原人南徙所经之一条路线,故沿赣江经赣州至横浦(今大余),入岭南南雄,均曾筑有驰道;汉武帝六年(公元前 135 年),当遣灌婴略定江南为赣州时,于赣州西南益浆溪(即益江水,今上犹江)曾筑防御南越入侵的古城(《太平寰宇记》)。武帝刘彻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当遣汉将杨仆出豫章下横浦南伐时,其舟师也是循此地而往;于此境内,置豫章郡具体辖领当时所设的赣县、永新、南康、雩都、虔化、庐陵等 18 个县地;入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分庐陵郡时,又置庐陵南部尉。于晋太元年(821)置南康郡,具体辖领南康、赣县、兴国、宁都诸县以南的大幅地方。即该境自秦汉后,曾一直是军事、政治中心,同属于中原遗民南徙常留的一处要地。证之考古材料:今永新、宁都、吉安、赣县、南康、兴国等地,也同样见有汉至六朝及唐宋期的墓葬保留。其中连接粤北地方的大余,还见保存有西汉时的南野故城原城址;^① 宜春等地,并有西汉木椁墓及汉代古墓群;^② 于赣州之南郊,还出土有中原常见汉代画相砖墓一座。^③ 南方(包括岭南)这类墓葬都一直罕见。今按画砖上所刻,它是墓主饮宴、出游的内容,其中墓主人正襟危坐,前置一几,两旁则分立有佩剑、握戟或匍匐候差人物,显示是属官吏身份;结合晋、南朝后不少墓葬还见有刻王朝纪年年号,故该墓主人也当是南徙的一员吏官或其遗裔。

秦汉时该境的原住居民,有称扬越、干越;东汉、三国吴称山越、武陵蛮;晋、南朝、隋、唐、宋后,则见有称武陵蛮、峒蛮、溪蛮及畲人,等等。上述业已徙入该境的中原徙民,无疑也都会和当地不同时期生存的原住居民杂处、共居与融合。今天赣中、南部地区作“老客家”与“新客家”称的居民,其中“老客家”称的,便是隋、唐、宋时徙入该地占有耕种土地生存的一支徙民;称“新客家”的,则是稍后特别是明清期间才徙入而且还未占有耕种土地生存的徙民。他们既都同作“客家”呼称,那于隋、唐、宋时的当地,都已有了由徙民与原住居民杂处后所组合成以客家呼称的方言群体了。但隋唐以

① 张小平:《江西历史文物》,1984 年第 2 期。

② 《光明日报》,1983 年 9 月 11 日。

③ 《文物》,1982 年第 6 期。

前呢？是否也已有了他们？则缺乏具体材料了。凭该地之向西南可通岭南粤地、往东南又可转通闽浙的这种地理位置，徙民留居那里，多只是一种途经性质，非属他们南徙之最终目的地。相关的事实如下：

今赣南古称虔州（今宁都）中有称“梅江”地方，其绕虔州城流过的那条河，也称作“梅江河”。而今于粤东北梅州地方也保留有以“梅江”作称呼的地方，其绕梅城流过的那条河，也同称作“梅江河”。今梅州出现的“梅江”称名缘起，有人据唐代李德裕过程乡“泣向寒梅近北枝”诗句，南宋杨万里七言律诗“一路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都曾提出“梅江”这一称名，是缘于当年梅州曾遍种梅花树木而起。但笔者凭依上举民族迁徙材料和梅州南朝时称程乡，唐末五代称敬州，至宋才有改敬州为梅州这一历史沿革发展史实，于唐时梅州，还正处于黄巢动乱，入宋，浙江的南宋王室也正处于逃徙，各地方中原徙民，正忙于跟着政局流亡，都不可能有此种诗情雅兴去为梅州地方作此梅树种植和以梅比称地名。从民族学的民族迁徙观点上说，今江西虔州和广东梅县两地出现以“梅江”称的地名、江河，都正是南徙中原居民徙途中，因对故居山河眷念而迁移故居地名于新地方所作的杰作。两地所称的“梅江”，都是唐后南徙徙民所留一种遗迹，亦是赣南徙民不愿在原地久留继而续向南方作出迁徙的一种见证。

凭此，对在赣南出现新、老客家称的群体，因居民都有较多的流动性，难以准确作出他们组成群体要比粤东北和粤北出现早的订定；但凭“客”与“畬”融合时赣南的“畬”都该从梅州徙去一节而言，对那里和畬组合成的客方言群体，应该不会早于梅州的客家方言群体。

六、关于“客家”称名出现

综合上面材料引述，中原遗民自秦汉向南方迁徙后，他们的群体，也都明显分有秦汉、三国吴、晋、南朝与隋、唐、宋后的众多不同时期之组合，中间有关称名，亦会有着它们前后出现的不同呼称。而今象客家群体中以“客家”称的，于秦汉中原遗民整体南徙途中，都是只代表着较晚的一个称名。然而其群体与其他称名出现，是否都是同步进行的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再作出赘述。

“客家”一词，“客”的对义词是“主”，而“主”与“客”在汉语中，是对人生存所据位置言谓的，当中原人踞着中原大地向外围作出迁徙时，他是居生存的主席——即主人位置；然而，一旦离开中原向外围迁徙时，其时的生存位置便转向了客席。从而南徙遗民，便有着诸如像《后汉书·马援传》中载马援纵放囚犯时有：“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又说“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的“宾客”、“客民”说；《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薛综“自臣昔客至此之时”的“昔客”说；同书《徐盛传》载徐“遭乱”之“客居吴，以气闻”的“客居”说；同书《刘淳传》载刘“客游卢陵”的“客游”说；南朝陈时徐陵《关山月》诗“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州”的“客子”说；《古诗十五首》“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客行”说等，诸作“客”的称说。而这些称说，都明显属于某些南徙士宦阶层徙途中的一时感怀之作，称说本身，都不含什么群体含意。

然而徙途中，当一些贫民百姓阶层像：《三国志·吴书》《吕范传》载吕“将私客百人归策（即孙策）。”出现有以“私客”称；同书《程普等诸将传》载孙权哀伤战死陈武时，《注》引《江表传》“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出现有以“复客”称；同书《孙策传》载“宾客愿从者数人”。同书《司马芝传》载郡主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现有以“宾客”称；《隋书·食货志》“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左右，佃客”，“佃客无过四十户。”出现有以“佃客”称。这些“客”称说时，因徙途中那些贫民百姓阶层为求生存，都已投靠了途中的地方士宦阶层，已沦为他们的一批奴仆、佃户。因而此时时间所云的

“客”，无疑都已有指被雇佣了的个人自身；但此自身，又都还未给徙途中“客”之群体挂上勾。即还属于个体客性质，非属指客家的群体。

又如三国吴建安五年(200)的军事名将孙策单骑外出时，《吴书·孙策传》曾载他“卒与客遇，客击伤策”。那时能够把这位军事名将击伤的“客”人，无疑当已与群体有了关连，但此中的人，到底是谁？是“佃客”、“宾客”这一类群的“客”呢？还是其他？却又尚不清楚。

由唐至宋，当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出现有“客户”与“主户”呼称时，其“主户”称的，当是指地方中原居民与南徙后已有了仕籍和占有土地的官户；而“客户”呢？依《徂徕集》卷八《录微者言》载“乃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而耕者，谓之客户”。即也还如上引佃户这类身份人物。所言户之本身，也还只是某一个体所组成的户，还未具体触及群体组织的自身深处。

又如唐贞元间遭贬广东连州任刺史的刘禹锡所作《莫瑶歌》中说瑶人“婚姻通木客”。此中和瑶族通婚的“木客”，按明邝露《赤雅》释，便是秦灭六国后遭到遣发岭南、从事伐木建造长安秦始皇“阿房宫”的原六国官贵的一支遗胄。他们，无可置疑，都是属于中原早期南徙岭南以“客”称的一员群体了，所称也当已与“客”称群体具体联系上了。

然而，此中见以“木客”称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又还有不同的解称，今就粤、赣、湘三省处出现的为例：

《太平寰宇记》所作《上洛山木客歌》有谓：“木客系鬼类。”宋朝苏东坡绍圣元年(1094)官谪岭南途经赣南作《虔州八景图诗》，称之为：“云外高人”。即其见以“木客”称的，在赣南隋唐迄宋相传是新、老“客家”所居地方，当地已经“客”称了的居民，却又都认为他们是“鬼类”，“云外高人”，根本不与他们所称“客”类。而它早期称的“木客”，与后来称的“客家”，又都明显还互有差别。

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群体称名，都是曾历经过从偶然出现开始，到形成称名的规律；曾先由他称，然后到自称，最后再由客观公认的这一发展规律法则的。而今对“客家”人中的“客”，从秦汉始后，在中原遗民漫长南徙途中，凭上面材料引述，也已曾经历过：客民、昔客、客居、客游、客子、客行等这些偶然的“客”称，与私客、复客、宾客、客户等这些已有了一定规律的“客”称，最后再定格，而把“客”与“家”连系起来，形成客观流行并且公认的一种“客家”称名。

而此一“客家”称名的含义，著名客家研究教授罗香林曾作了“客而家焉”此一非常准确而又贴切的定语。“客家”之所以有别于“木客”或其他的“客”称，关键便在于它“客”后已给缀了一个“家”字。而此“家”，已非单门独户所组成的个体之家；而是以宗裔为主体的，由同一个宗姓裔民作为群居、群聚的“合起宗”式之家。再具体的说，便是今天赣南和粤北以宗姓为主体所建城堡式(有称四角楼)的，于闽西地所建圆或方形土楼式的，在粤东北梅州地为中心所建半圆形的围龙屋式的这种聚宗裔而居之“家”建筑。这样的“家”建筑，因都是以宗裔群聚，对内对外都已有一种群聚力量，利于在客地与其他群体作抗衡，也较易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权利。

可是此一种“客家”称呼，还非循依群体习俗习惯而作出命名呼称的。中原汉族裔民的习惯称呼，多按原出地方、邑籍而作呼称；如梅县出生的称梅县人；江西出生的称江西人；唐代张九龄于曲江出生的，称张曲江；秦末汉初尉将任嚣，原出河北高乐县的，他于所制陶件中，便遍印“高乐”之词；汉初南越王赵佗，因是河北真定诞生的，故于所建五华狮雄山台城遗址的瓦当上，也见刻“定”字(“真”字还未找到)，等等，这些史实便都是例证。故对此有作“客家”呼称一词，最早也该是缘于从事民族著论与作注释的众多学者之手。称呼本身，也先沿学者的他称，再由群体承认，作出最后的自称这种轨迹而发展成的。相关事例如下：